

海

外

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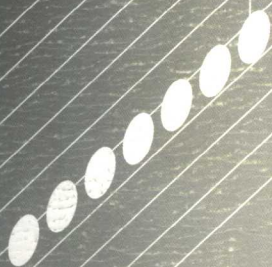
人

丛

书

现代性的追求

李欧梵 著



李欧梵 著

海外学人丛书

H A I W A I X U E R E N
C O N G S H U

现代性的追求

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李欧梵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2
(海外学人丛书)
ISBN 7-108-01472-6

I. 现… II. 李… III. 现代史:文化史-研究-中
国 IV. K2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0265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扉设计 董学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字 数 242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8.80 元

序 言

李欧梵

这本论文集从头到尾都是王德威教授一手策划完成的,他发动了不少研究生作吃力不讨好的翻译工作,并亲自编排目次,在每辑加上小标题,并大力鼓动麦田出版公司出版这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我本想请他为这本集子写序,但他却只答应写后记,所以我只好在为别人写序之余也为自己的旧作写几句。

虽然在文学理论上我不相信作者已死、文本至上,但在实践上——特别对于自己的作品——我却坚守一个文本独立、自生自灭,与作者无关的原则。这本集子既是德威编的,所以我只回答几个编辑上的小问题,脚注的补足及原文的校对则是托陈建华先生尽责的。陈先生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现在重新在美国做研究生,在哈佛攻读,他对这本集子下了不少工夫,在此一并致谢。部分文稿的中译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刘剑梅、廖世奇、陈绶绮、何素楠(Ann Huss)完成,也要谢谢他们的辛劳。

既然写序,我也许应该把这些文章的学术背景稍作一个交代。

这些论文是在不同的时期写成,最早的约在 70 年代初,即第三辑中的两篇“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记得当时美国大学尚无现代中国文学这门专业学问,虽然中国大陆的文学史教材一大堆,英文的宏观材料尚付阙如,所以这两篇滥竽充数,用的多是中文材料,但在诠释方面则是一脉相承夏氏兄弟——夏济安和夏志清教授——的家传,我忝为济安先生的受业弟子,而多年来也从志清先生处受益良多。半世纪以来,美国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只有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本,无论后来学者对其观点有何争议,它的奠基之功是绝不可没的,这本书已成了“古典”(classic)和“传统”。而我对传统的看法是一向反对五四和文革的观点,我主张继承而不赞成扬弃,更反对以挾伐前人之功而作自己学术进身之阶的行为。所以,这本论文集的内容虽与志清先生的关注点不尽相同,但没有《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启示,我也不会下决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我在大学时代学的是西洋文学,在美国念研究院时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所以在方法上我永远徘徊于历史和文学之间。而个人兴趣更是既中亦西,乐此亦乐彼,但却缺乏比较文学上的严格训练。有心的读者,当可在这些文章中看到不少方法上的兼容并包,但却不甚稳定的优缺点。而对大陆上的现代文学研究方法,我往往故意唱反调,譬如不赞成把文学史腰斩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时期。而多年来我就一直在“超越”在大陆学术界挂帅的现实主义和革命主潮。所以第二辑中对浪漫和颓废方面的偏重,以及对文学上“现代主义”及文化史上的“现代性”(modernity)的探讨,都是个人的反潮流的学术尝试。至于有关电影和文化批评的论文,则反映了近几年来的兴趣。我一向是个影迷,而对香港电影之“迷恋”,更早于香港电影在美国吃香之

前,因为我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多元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商品。有鉴于西方的“后现代”理论风起云涌,但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却不着边际,目前反而变成时髦口号,所以我也稍作一点“反潮流”的工作,试从海峡两岸三地的文化实践的研究上探讨当代世界文化的意义,并以此与美国学院中的“多元文化”理论作商榷。由此看来,面对中国和美国大陆学界,我都故意站在边缘的地位。

走笔至此,似乎已经犯了作者意旨介绍过多的大忌,必须就此打住。关心现代文学的读者和同行或可在这些内容零乱的“文本”中得到些许启发,也可把它当作研究上的初步材料,有待教正。如果这些“明日黄花”能够真正引起“明日”——年轻一代——台湾或大陆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则是我最大的愿望和荣幸。

1996年8月31日 剑桥

海

外

学

人

从

书

王德威

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

石元康

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

余英时

论戴震与章学诚 —— 清代中期学术
思想史研究

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

何炳棣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

杜维明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作者简介

李欧梵，1939年生于河南。后随家迁台湾。196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赴芝加哥大学读国际关系，复转至哈佛大学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1964年获硕士，1970年获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中文著作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中西文学的徊想》、《狐狸洞话语》、《范柳原忏悔录》、《铁屋中的呐喊》等。本书为第一本英文论文的译文集。

目 录

序言	李欧梵(1)
【辑一·真的恶声】	(1)
“批评空间”的开创	
——从《申报》“自由谈”谈起	(3)
来自铁屋子的声音	(23)
【辑二·浪漫的与颓废的】	(43)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个人主义	(45)
孤独的旅行者	
——中国现代文学中自我的形象	(70)
情感的历程	(91)
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	
——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	(111)
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	(125)
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	(141)
【辑三·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	(175)
追求现代性(1895—1927)	(177)
走上革命之路(1927—1949)	(248)
编后记	王德威(340)

辑一

真的恶声

“批评空间”的开创

——从《申报》“自由谈”谈起

一、“公民社会”还是“公共空间”？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或译“市民社会”)的讨论颇为激烈,中国是否出现“公民社会”遂成为争论的问题。然而,哈贝玛斯对于“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的论述,似乎较少引人注目,甚或与“公民社会”混为一谈。我个人认为前者是哈贝玛斯基于欧洲 18 世纪以降(特别是英、法、德三国)的政治史衍演而生的一种理想模式,虽基于史实,仍是一种有关现代性的理论陈述,将之硬套到中国社会,实在不必要,内中牵涉问题太多。甚至“公民”及“社会”这两个名词,中国本来就没有,晚清时译介到中国,大多是经由日本而来,而中西文化背景不同,甚至对于“公”的概念也歧异甚巨。总之,我是反对近年来美国汉学界确定中国有公民社会的看法。

然而,对于“公共空间”的问题,虽然在哈氏理论中与“公民社会”密切相关,但不必——也不应该——混为一谈。我认为它指涉的是构成公民社会的种种制度上的先决条件,而这些制度

的演变可以作个别的探讨。所以我一向把“空间”一词视为多数,在英文词汇中是 space,而不是 sphere。而中国学者似乎对“空间”一词较易认同和共鸣,而对 sphere(领域)一词反而不易了解。

我对哈贝玛斯学说的故意“误读”,目的是在探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问题:自晚清(也可能更早)以降,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所谓“公共”,这里指的不一定是“公民”的领域,而是梁启超的言论——特别是所谓“群”和“新民”的观念——落实到报纸而产生的影响。换言之,我认为晚清的报业和原来的官方报纸(如《邸报》)不同,其基本的差异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而“社会”一词恐怕也是恰在此时开始经由日本而传入中国)。这种新的“公共”的声音,是如何形成?用什么形式表现?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而它表现的园地,也因之而成为一种新的“空间”。再浅显地说,我觉得报纸的“副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它非但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传统,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媒体”的理论: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和印刷媒体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报章杂志特别重要,然而西方报纸并没有一种每日刊行的副刊。至于它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此处不能细说。且先从晚清一个众所周知的报纸副刊说起。

二、“自由谈”的游戏文章

上海的《申报》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大报,创立于梁启超办报

之前。然而,到了20世纪初年,它显然也受了梁启超和其他晚清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内容上出现了反映社会风气和批评时政的文章,刊于“自由谈”版(显然也是受了梁氏《自由书》的启发)。这类文章的栏目和格式很多,诸如:“新乐府”、“新丑史”、“新笑史”、“海外奇谈”、“忽发奇想”、“轩渠杂录”、“新回文诗”等等,当然还有长篇小说(大多是改译)的连载。而这些栏目出现最多的是“游戏文章”。我觉得“游戏文章”是“自由谈”的主要特色,内中不少文章饶有风趣,也最能代表晚清到民初的文化批评。所以在此仅略选几篇分析,以求引起学者同行的兴趣。

“游戏文章”这个专栏的始作俑者是谁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游戏”二字,可能受到李伯元主编的《游戏报》的影响(此栏第一次出现的时间约在1911年左右),其宗旨可以在一篇自我指涉的《游戏文章论》中(载于民国六年,即1917年10月6日《申报》第四版“自由谈”)看到全貌(此文所引文章的标点皆由我附加):

自来滑稽讽世之文,其感人深于正论,正论一而已,滑稽之文,固多端也。盖其吐词也,隽而谐;其寓意也,隐而讽,能以谰言中人之弊,妙语解人之颐,使世人皆闻而戒之。主文谏谏,往往托以事物而发挥之,虽有忠言谏论载于报章,而作者以为遇事直陈不若冷嘲热讽、嬉笑怒骂之文为有效也。故民风吏政日益坏,则游戏文章日益多,而报纸之价值日益高,则阅者之心日益切,而流行者日益广。官吏恣其笑骂,讥刺寓乎箴规,则世之所谓俳谐者乃所以警世也。文士读而善之,欲假文字之力挽颓靡之世局,上之则暗刺夫朝廷,下之则使社会以为鉴。虽有酷吏力无所施,言者既属无罪,禁之势有不能,则其心自潜移默化。故其大则救国,次

足移风,而使奸人得借以为资而耻,至悟其罪过,痛改以成良善之民而后已。此前史所载《滑稽列传》常如此者,非戏言也。夫为主笔者,非欲学刘四骂人而为谑浪笑傲之语,盖其天职而势使之然也。夫严正之文不幸而触忌则祸斯及矣,苟其不然,取而禁之易也。游戏之为文,虽欲弗闻而势有不得辄去也,《毛颖传》之类是也。故曰深于正论者谓此也,不亦善哉?

以上是这篇文章的全文。作者署名济航(寓意同舟共济?犹如《老残游记》开头的梦?),而副标题为:“仿欧阳修《宦者论》”,在形式上似乎是在仿古,然而时代毕竟不同,济航的身份和角色也和欧阳修大异其趣,至少,此文作者已非士大夫阶级的精英之士。他在文中把官吏和文士作了区分,对前者的贬意颇为明显,而对后者则颇为认同,所以觉得自己的“天职”是“假文字之力挽颓靡之世局”)其时中国的政局也颇颓靡:袁世凯刚死,军阀争权之势正在展开)。然而文字之力是否可以力挽世局?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书写文学的重视,甚至认为“大则救国,次足移风”。所谓“救国救民”已逐渐成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口号,是否可以经由文字之力达到目的,则是一个实践上的大问题,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想。我觉得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倒是次一种目的:转移社会风气,也就是民风的问题。在此文中,民风和吏治(“日益坏”)似乎是分不开的,然而又有上下之别:“上之则暗刺夫朝廷,下之则使社会以为鉴”——这是一句在意象结构上颇有象征含义的话,它把朝廷和社会作了某种对比,而朝廷虽高高在上,何敢暗刺?中国传统士大夫对朝廷的批评是经由“言路”,这也是由朝廷控制的一种谏御制度。到了晚清,朝廷和京城的官吏已经无法应付世局的危

机,所以才有变法维新之举。但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维新分子已经逐渐把注意力(包括他们的“文字之力”)转向“社会”这个新的领域,而将之与民风合在一起。这种论述方式,事实上已经在开创一种新的社会的空间,而从这种新的空间基础上建立“新民”和新国家的思想,所以梁启超早年才把小说和群治的关系列为重点。所以,这篇《游戏文章论》仍然继承了梁启超的观点(虽然梁本人在后期已另作他想),然而较梁氏尤有进之的却是对“游戏”式的文章的看法,将之和“严正之文”对比,而认为更“深于正论”,功用更大。

三、一种边缘型的批评模式

游戏文章的传统当然古已有之,此文提到《滑稽列传》,认为实非戏言。如果用较新的看法,也可以把“戏”的领域扩大到戏台上。元杂剧的戏台上,插科打诨的小丑说话是“言者无罪”的;中国又有所谓“狂夫之言”,现代人所作的“疯言疯语”,也属于类似的一型,都是正统言论边缘的“话语”,都是对于“中心”有异议的,所以我认为这显然是一种边缘型的批评模式。它和中心话语的“正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滑稽讽世”。用现代的话说,这滑稽可以是幽默,也可以是讽“刺”——用滑稽的形式或明或暗地来讽刺政治和社会。所以在文体语言上就出现了“反讽”(irony)和“嘲讽”的形式。“反讽”说的是指桑骂槐,但基本上是作者和读者连成一线,都知道文本中的语言是反话,当然更复杂的反讽形式在文学作品中很多。至于“嘲讽”,就内容而言可以作故意的、有目的的讥嘲(satire,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大多采用

这个模式)。而我所关心的是文体形式上的“嘲弄”或“玩弄”(parody),这种作法非但有创新的意义,而且似乎也最适合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所谓拟古或仿古,在模拟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对旧形式作了玩弄,从而开创新的语意。我认为游戏文章的长处正在于此,它既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文体,也和这个时期的媒体——报纸——关系密切。有了这种“嘲弄”的文体,就可以在社会上达成一种连锁功用:“民风吏治日益坏则游戏文章日益多,而报纸之价值日益高,则阅者之心日益切,而流行者日益广。”这个连锁反应的论述,事实上已经牵涉到媒体理论中的读者(或观众)和“流行”的问题。换言之,报纸读者的阅读兴趣,是经由文体的游戏而带动,读者越多,报纸越流行。而流行的功用不仅是商业上的利益(资本主义者所谓赚钱),也可以在文化层次上转移社会风气。所以早在宣统三年七月初五日(即1911年8月28日;《申报》“自由谈”页首将中历列于右,西历列于左,可能也是一个创举),《申报》“自由谈”就刊出一个公开的“征文告白”:

海内文家如有以诗词、歌曲、遗闻、轶事,以及游戏诙谐之作,惠寄本馆,最为欢迎。即请开明住址,以便随时通信,惟原稿恕不奉还。

如果以上所引的游戏文章部分是由征稿而来,这个半公开的园地更属开创的新空间,它至少为社会提供了一块可以用滑稽的形式发表言论的地方。

这些言论——“游戏文章”的题材——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而批评时政的尤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总的来说,似乎和当时流行的时尚、价值、风气,和政治事件有关,许多文章都是有感而发,在针对时弊之余,往往也作插科打诨,二者衔接得宜